

北医三院

韩启德

Peking University Third Hospital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主办 2016年9月8日（本期四版） 第20期（总第393期）

扫描医院官方微信订阅号、服务号,关注北医三院更多资讯、预约挂号、专家信息。



订阅号
二维码



服务号
二维码

著名医学家张丽珠教授逝世

中国共产党党员、著名医学家、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妇产科创始人、生殖医学中心名誉主任、中国大陆首例试管婴儿缔造者张丽珠教授因病医治无效，于2016年9月2日18时19分逝世，享年95岁。

张丽珠，白族，1921年生于上海。1944年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获医学博士学位。

1944年—1946年 上海沪西妇产院住院医师

1946年—1949年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医学中心、约翰·霍普金斯医学院博士后，从事妇科局部解剖学、病理学、内分泌学、癌瘤早期诊断研究

1949年—1951年 英国伦敦玛丽居里医院，妇产科住

院医师，总住院医师

1951年—1952年 上海圣约翰大学医学院妇产科副教授

1952年—1958年 北京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妇产科副教授

1958年—1996年 北京医学院第三附属医院（现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妇产科主任（至1984年），副教授、教授，博士生导师

1991年—1995年 中华医学会妇产科分会副主任委员

1981年—2006年 《中华妇产科杂志》副主编

2001年起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生殖医学中心名誉主任



—— 张丽珠教授的一生 ——



1988年与大陆首例试管婴儿合影

张丽珠教授，我国著名医学家、现代生殖医学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中国大陆首例“试管婴儿”的缔造者，原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妇产科主任、中华医学会妇产科分会副主任委员、《中华妇产科杂志》副主编，北医三院生殖医学中心名誉主任，因病医治无效，于2016年9月2日18时19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5岁。

张丽珠教授1921年1月15日出生于上海。白族，医学博士，教授，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父亲张耀曾是老同盟会会员，做过孙中山先生的助手，是1912年《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和1913年《中华民国宪法草案》的主要起草人。家庭的熏陶和影响对于张丽珠来说是一份难得的财富。她1937年从上海工部局女子中学毕业，获德、智、体全面发展学生奖；1944年毕业于圣约翰大学医学院，获得医学博士学位，并获得当年最佳优秀毕业生奖。

随后，张丽珠前往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和纽约大学医学院进修妇产科内分泌学和局部解剖学，后又在霍普金斯大学学习妇科病理和妇科手术。深厚的临床和科研功底，使她在学术上初露端倪。由于她所做的肿瘤早期诊断课题属于当时的前沿领域，张

丽珠很快接到了英国玛丽居里医院的聘书。1950年10月，张丽珠获得英国皇家妇产科学院文凭。

张丽珠牢记父亲所说“要为人民为社会作出贡献”的教诲，抱着“出国就是为了学本领，学成后就应该回来”的坚定信念，尽管自己在国外的事业蒸蒸日上，始终如一的家国情怀促使张丽珠毅然决然辞掉在英国的工作，重返祖国。

归国后，张丽珠长期致力于妇产医学的研究和临床工作，并不遗余力地培养人才和进行学科建设。1958年参加北京医学院第三附属医院（现为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的创建，任妇产科主任至1984年。2001年被聘为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生殖医学中心名誉主任。

作为北医三院的建院元老和妇产科的创立者，张丽珠与众多北医三院前辈一起白手起家，历经风风雨雨，几十年如一日辛勤工作在妇产科医疗、教学、科研的第一线，为我国妇产科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作为医学大家，张丽珠为无数承受疾病折磨的妇女撑起生命的绿荫。她无比敬业、勤奋、耿直，学识渊博、经验丰富、医术精湛，全身心倾注在妇产医学事业。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期，位于海淀区学院路的北医三院妇产科，在门诊病人中遇到大批来自“八大学院”女学生闭经，张丽珠教授经过深入研究发现，其发病与劳累和营养不良有关。在治疗月经病等女性生殖内分泌疾病的同时，又接触到大量的不孕不育症患者。张丽珠教授将研究重点转向生殖内分泌与不孕不育领域，上世纪七十年代在国内率先开展了性激素检测新技术，建立了国内最早的生殖内分泌实验室。

文革中，两次长期下乡，身处逆境中的张丽珠，在炕头上接生，果断处置难产，抢救了大量危重孕产妇。在极其简陋的条件下，为严重子宫脱垂患者做手术，在炕头上给学生们授课。

改革开放后，在世界首例试管婴儿诞生（1978年7月）喜讯的感召下，张丽珠教授从1984年开始致力于试管婴儿的研究工作，在经费短缺、设备条件极其匮乏的艰苦条件下，张丽珠教授带领团队克服困难，艰苦奋斗，利用精湛的临床技术在为不孕症患者进行妇科手术的同时取卵进行体外受精，为大陆试管婴儿技术的成功实施奠定了重要基础。1988年3月10日在北医三院诞生了中国大陆首例“试管婴儿”，使我国生殖医学和辅助生育技术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成为我国生殖医学发展的里程碑，张丽珠教授也因此被誉为“神州试管婴儿之母”。随后张丽珠教授又于1992年6月培育出我国首例赠卵试管婴儿，1995年2月培育出我国首例冻融胚胎试管婴儿，1996年9月培育出我国首例代孕母亲试管婴儿，1998年成功获得单精子卵浆内注射试管婴

儿。

张丽珠教授培育“试管婴儿”的科技成就，已写入我国中学生物教材课本，并在2008年被中国科学技术协会评为建国五十年来10个影响中国的科技事件之一，位居第五位。前四位分别是“两弹一星”、杂交水稻、载人航天和“探月工程”。

张丽珠是杰出的临床专家和医学教育家，培养了大批优秀医学人才，更把医者兼学者的责任及精神传于后辈。1955年，张丽珠开始担任国内第一批妇产科研究生的导师。1982年晋升为教授，1984年被聘为博士研究生导师。1989年起任国家重点学科学术带头人。主编有《中国大百科全书妇产科学分册》、《妇产科经验教训101例》和《临床生殖内分泌与不孕症》；参加编写《临床妇产科学》及《人类生殖调节图谱》、《中华妇产科》等多部著作。

1991年至1995年任中华医学会妇产科分会副主任委员，后任顾问，《中华医学杂志》英文版编委，自1981年任《中华妇产科杂志》副主编。在国内、外重要杂志发表学术论文100多篇。

张丽珠在国内外医学界有较高影响力，曾应邀参加重要涉外社会活动。1980年，受联合国培训和研究机构（UNITAR, United Nations Institute for Training and Research）邀请去挪威奥斯陆（Oslo）参加“变化社会中创造性妇女”讨论会，并作为中国妇女代表参加在丹麦召开的第二届世界妇女大会，在非政府组织论坛上介绍了我国妇幼保健及计划生育工作，备受关注。

张丽珠曾荣获全国和北京市“三八”红旗手（1979年）、全国卫生先进工作者（1983年）、北京市“五一”劳动奖章（1988年）、北京市科技进步一等奖（1988年）、全国科技进步二等奖（1989年）（第一完成者）、北京医科大学“桃李奖”（1989年）、全国优秀归国侨眷知识分子（1989年、1995年）、北京市先进工作者（1989年、1995年）、北京市归侨先进工作者（1990年）、卫生部科技进步奖（1990年、1996年）、教育部提名国家科学技术奖（2003年）、首届“女医师终生成就奖”、“北京医学会医学成就奖”（2010年）、中国生殖医学终身成就奖（2011年）、“宋庆龄樟树奖”（2011年）等奖励和荣誉。

张丽珠教授的一生是不懈奋斗的一生，是全心全意为患者服务的一生。她白手起家，勇攀高峰，创造多个中国“第一”；她把患者当亲人，一切从患者利益出发，为无数家庭带来了福音。

张丽珠教授的逝世是我国妇产科和生殖医学界的重大损失，也是我国医学界的重大损失。她的奋斗精神和品格将永远留存，继续鼓舞后辈为医学事业的发展 and 进步不懈努力。她为中国妇产事业所作的贡献将永载史册，她开拓创新的精神将激励着一代又一代年轻人，她用爱编织的温暖将永存患者心中。

本版责编：姚永玲



1989年与试管婴儿三胞胎合影



手术进行中



90年代门诊出诊

张丽珠：岁月留痕 爱在延续

20年前，一声嘹亮的啼哭宣告了我国大陆首例试管婴儿的诞生。作为这个小生命的缔造者，张丽珠的激动之情一点儿也不亚于婴儿的母亲。

10年前，在这位幸运儿的10岁生日庆祝会上，孩子的母亲拉着张丽珠的手，热泪盈眶地说：“您圆了一个39岁女人做母亲的梦！”

而今，时隔廿载的喜相逢，曾经的那个小生命已成长为一名开朗上进的大学生，而耄耋之年的张丽珠端详着这个孩子，眼神一如20年前慈爱和惊喜。

岁月留痕，张丽珠留给母亲们的是爱的延续和一个个美好生命的成长足迹。

“1988年3月10日8时56分，萌珠出生了。体重7斤8两，身长52厘米。”20年过去了，许多过往的人和事都有点模糊，可是张丽珠对这个小生命——中国大陆第一例试管婴儿出生时的记忆仍清晰如昨。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保存着的一份档案，清楚地记载了该婴儿的孕育过程：

1987年6月24日，张丽珠在给一位有20年不孕病史的妇女做开腹手术的同时，吸取卵泡，获得4个成熟的卵子；然后，将这位妇女丈夫的精液进行两次清洗，加入培养液。待最活跃精子上游获得穿透卵子能力时，进行体外受精。

6月25日，在显微镜下，张丽珠惊喜地看见了受精卵的雄原核与雌原核。体外受精成功了！珍贵的4个受精卵分别被放入生长液中继续培养。

6月26日，有的受精卵分裂为3~4个细胞，有的分裂为4~5个细胞，即已成胚胎。张丽珠用一根特制的塑料管将胚胎植入妇女子宫内。

7月10日，妇女出现早孕反应。

8月3日，B超检查发现胎儿心脏搏动，生命过程已经开始！

7个月后，一个小生命的呱呱坠地，使张丽珠置身于媒体的聚光灯下。

没有做不到的，只有想不到的

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初，张丽珠和她领导的研究小组就开始了体外受精和胚胎移植技术的研究。“在正常情况下，精子和卵子在输卵管碰头，结合成胚胎，继而在子宫内发育，这叫怀孕。如果输卵管不通，精子和卵子碰不上头，就谈不上怀孕了。”张丽珠说，“所以，我觉得有必要做体外受精和胚胎移植，让精子和卵子在体外碰头，形成胚胎后再移植到子宫里去。”

尽管世界上第一例试管婴儿10年前就已在英国诞生，几年后我国香港和台湾地区也各有一例试管婴儿诞生的报道，但张丽珠面对的却是中国改革开放初期“一穷二白”的科研条件。当时通用的取卵技术是腹腔镜取卵。可是，在大量病例的调查研究中，张丽珠发现中国内地的情况有所不同，我国北方的输卵管阻塞病症，有31.3%由结核引起。“对这些病人使用腹腔镜，根本看不见卵巢表面，看不见卵泡。在初期，我们采取的策略是：开腹手术治疗盆腔疾病的同时取卵，用手摸到卵泡所在。后来，这一技

术发展为在B超引导下一根针取卵。”张丽珠回忆说。

取卵用的引导穿刺针，当时仅有为数不多的几根，不能用一次就扔。怎么办呢？只能清洗、消毒后再用。可时间长了，穿刺用的针头却变钝了。没想到几天之后，张丽珠竟像变魔术似的把钝了的针头又恢复了原样。在大家好奇地追问下，张丽珠道出实情：“钟表匠干的都是细致活儿，我就请他来修理修理我们手术用的针，直到后来，针头上的螺纹全部磨光了。”同事们说，在老太太眼里，“没有做不到的，只有想不到的”。

卵子取出来后，须立即进行体外受精。张丽珠说：“我们经常是双手捧着放在保温瓶内的几管刚吸出来的卵泡液，一路小跑穿过操场，送到组织胚胎教研组去寻找卵子，哪像现在从一个窗口递进去就行了！”

这样的尝试不可能一次就成功。在萌珠出生前，同样的条件、同样的方法张丽珠做了12例，一次又一次的失败并没有让她灰心。凭着这样一股子劲儿，1988年3月18日，我国大陆首例配子输卵管内移植婴儿在张丽珠带领的团队手中诞生，而第二例试管婴儿于1988年5月27日诞生。这些成果先后获得北京市科技进步一等奖和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张丽珠作为项目第一完成者，并没有就此“收手”。1989年底，她开创的B超下一根针取卵因创伤小、可重复进行，被列为常规取卵法。她带领自己的团队进行试管婴儿周期1300多次，使临床妊娠率从早期的6.4%上升至32%，活率率达到20%。中国由此在这一技术上迈入国际先进行列。

上世纪90年代初，张丽珠独辟蹊径使一位因染色体异常、自身卵细胞不可用而屡次怀孕失败的患者成功做了母亲。这样，我国大陆首例赠卵试管婴儿于1992年6月12日出生了。张丽珠的患者中有一位40多岁、将近绝经的女教师，其子15岁时遭遇意外事故身亡。在张丽珠的帮助下，女教师接受赠卵，并成功分娩。赠卵试管婴儿技术在计划生育中的生殖保险意义凸现出来。

3年之后，我国大陆首例冻融胚胎移植成功，又是出自张丽珠之手。被誉为“神州试管婴儿之母”的张丽珠平静地说：“目前，生殖医学已经成为一门新的独立学科，做不完的工作还在继续呢。”

从病人那里得到安慰和满足

冻融技术面世后，很多人非常震惊，因为患者是一位先天性无卵巢无月经的妇女，而其丈夫又患有无精症。媒体不断要求会见患者，张丽珠坚决反对，因此被人误解为“其中必有不可告人之事”。面对人们的不理解，张丽珠说：“他们毫不懂得希波克拉底誓言中的一条：医生除了无私地为病人进行诊治外，还要尽量保障病人的隐私权。”

在中国这样一个传统观念根深蒂固的国家，试管婴儿这种非自然孕育的方式从一开始就受到排斥。有人曾责问张丽珠：“中国那么多人口，你为什么还要搞试管婴儿？你这不是和国家的计划生育政策对着干么！”张丽珠赶紧查阅了相关文件，发现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是少生、优生，但还有一条：帮

助不孕的病人怀孕。看到这一条，张丽珠心里踏实了。

后来，又有人称，通过辅助生殖技术出生的婴儿更有可能患上自闭症、癌症、脑瘫、智障等疾病。对此，张丽珠细心关注了国际和国内的最新调查结果，发现接受试管婴儿技术治疗的不孕夫妇，生出表形缺陷儿的发生率与正常人群相似，两者之间没有统计学意义上的差别。

除了对技术本身的质疑，试管婴儿技术更多地面临着伦理上的拷问。当中国大陆首例试管婴儿出生后，电视节目播出了这样一个情节。一位老太太面对孙子如果是通过试管婴儿技术而来的假设，当即坚决地表示：“他不是我孙子，让他滚。”张丽珠说：“当听到老太太说‘让他滚’三个字的时候，我就像听到她让我滚一样，心里很难受。”

但是，患者的期待和感激让张丽珠有了前行的力量。

一位患者在寄给张丽珠的贺年卡上这样写道：“世界上没有比生命更贵重的了。我们拥有爱，拥有家庭，却没有新生命，这种痛苦是无法用语言表达的。”还有一些患者进门就说：“医生，这是我们的最后一站了，要是再不行，我们就认命了。”张丽珠说：“病人的迫切希望让我觉得有责任搞好试管婴儿技术。”

尽管有难受的时候，但张丽珠依然觉得值得。这几年，她走在路上或逛商店的时候，经常有人走过来握住她的手说：“我的儿子就是你接的生，他已经30多岁了。”也有人突然过来给她鞠个躬说：“我的手术是您做的，您救了我的命。”虽然也遭受过物质上的匮乏和精神上的重压，张丽珠却说：“我们能从病人那里得到安慰，从好的治疗效果中得到满足。”

除了祖国，处处都不可为家

1944年，张丽珠从上海圣约翰大学医学院毕业时，有两个选择，一是内科，一是妇产科。她选择了后者，在上海沪西妇产医院做了两年住院医师。此后的60多年，她从来没有一天离开过妇产科。

抗战胜利后，张丽珠前往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和纽约大学医学院进修妇产科内分泌学和局部解剖学，后又在霍普金斯大学学习妇科病理和妇科手术。此时，她在学术上的造诣初露端倪。由于她所做的肿瘤早期诊断课题属前沿领域，张丽珠很快接到了英国玛丽居里医院的聘书。1950年10月，张丽珠获得英国皇家妇产科学院文凭。

正当自己的事业蒸蒸日上的时候，张丽珠决定辞掉工作，重返祖国。“出国就是为了学本领，学成后就应该回来。1951年起，我一心一意想回来。”张丽珠说。没想到，回国的第一步就遭遇暗礁——有人向她索要“入境准许证”，否则不卖船票。张丽珠急了：“我回自己的祖国还要准许证？”无奈之下，只好托人帮忙周旋。一边焦急等待，一边在巴黎参观访问的张丽珠不久收到了国内来的电报，上面只有5个字：“欢迎你回国”。张丽珠却从中感受到了祖国的温暖。后来她说：“这是一个决定我一生命运的通知”。



1981年研究生答辩会，右起第四为张丽珠教授



1987年，对郑萌珠母亲进行孕期检查



访问香港，在大学宾馆门前

与诺贝尔奖获得者、
世界首例试管婴儿缔造者Edwards教授会面

1979年，针灸麻醉



2004年受日本妇产科学会邀请到东京作大会报告

回国途经香港，张丽珠借机参观了香港的学校和医院。医院方面听说张丽珠的父母早已去世，国内了无牵挂时，试图挽留她：“像你这样的人，何处不可为家？”张丽珠拒绝了。在她心中，除了祖国，处处都不可为家。当她终于踏上大陆，第一次亲眼看见珠江上空飘扬着的五星红旗时，禁不住心潮澎湃。

受着西洋教育的张丽珠回国后给北京医学院的学生们讲课时，却能做到“一个英文词儿不露，甚至连标点符号都表达出来了”。让学生们印象最深刻的还有她讲课时的开场白——“今天很高兴在课堂上和大家见面”，很有异国风味。

此后的道路开始崎岖不平。1964年和1969年，张丽珠响应号召随同巡回医疗队来到农村。在延庆的一个村庄，有一位老大娘患有严重的子宫脱垂，整个子宫带着膀胱和直肠挂在阴道外面，多年不曾下炕。在军宣队的督促下，张丽珠开始给大娘做手术。因为病人子宫粘连严重，张丽珠只好小心翼翼地剥离。手术进行中，病人血压已经很低，处于半休克状态，情况紧急。军宣队讨论之后，诊断为内出血，命令张丽珠开腹止血。张丽珠不肯做，她认为病人应该输血。“我知道不听他们的话，如果大娘有个三长两短，我也活不成。”但病情不允许她照他们说的办。张丽珠冒着风险坚持自己的主张，让同来的医生都为她捏了把汗。万幸的是，在张丽珠的治疗下，第二天大娘的血压慢慢上升，好了起来。等到春暖花开，大娘下地了，可以上山看桃花了。张丽珠这才回医疗队。

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都不可避免地经历了“文革”浩劫。后来，有很多人问张丽珠：“你当年要是留在香港就好了。”张丽珠不以为然。她还记得自己独自来到老乡家时，他们会偷偷地给她沏糖水，老乡的朴实憨厚张丽珠铭记在心头。当记者问她：“你现在对回国觉得懊悔吗？”张丽珠答：“时到如今，‘懊悔’这两个字也绝不会从我口中说出。”

她的严格有时还真让人受不了

逆境对张丽珠来说，是另一种形式的挑战。她经常对自己的学生说：“攀登医学的高峰，不是一跃而上的，而是一步一个脚印地走出来的。”

1955年，张丽珠开始担任国内第一批妇产科研究生的导师。她对医学进展非常关注，经她提出的研究课题有着广阔的前景，如“硫酸镁对子宫收缩的影响”，至今仍是研究热点。1960年，大批女学生闭经事件引起了她的注意。她进行深入的调查，奠定了对各种病理闭经的大病机制和诊治的研究基础。她还最早将黄体生成激素释放激素 GnRH- α 应用于妇科疾病的诊断和治疗，挽救了不少濒临死亡的患者。

一位研究生在写给张丽珠的信中坦言：“您的严格有时还真让人受不了。”不光做研究，就是在查房中，张丽珠的严格也是出了名的。她要求主管医师要对自己的病人完全了解，将病人的情况牢记在心。“最让我不耐烦的是，医生手拿病历，照本宣科，回答患者问题的时候还必须先翻阅病历。”

“扎实的功底”是张丽珠在教导学生时反复强调的，她告诉他们不要一心想着“走捷径”。“譬如，妇科检查中最基本的一项是阴道检查，但现在一些医生更依赖仪器。在门诊问了病史，就做阴道B超。而子宫直肠窝的结节伴有明显触痛或附件区压痛，不做阴道检查很可能被漏诊。另外，做阴道检查时，医生应当将左手深入阴道，肘部和前臂呈90度角，

以身体前部顶住肘部向前，使前进力量受到控制，而右手用来持器械。最近一位妇产科医生告诉我，医院用左手做阴道检查的医生只有她一人了。对新事物、新技术跟得紧是应该的，但丢了妇产科的优良传统使我痛心。”张丽珠有些忧虑地说。

虽有风风雨雨，却无怨无悔

在一双儿女眼里，张丽珠也是一位严格的母亲。儿子小学时酷爱乒乓球，暑假期间到体育场接受集训。他是年龄最小的队员，对体育场的生活很不习惯，几天后跑回了家。当时，张丽珠狠狠地训了儿子。1969年，儿子被发配到北大荒，刚去就遇上了饥荒，很多同去的学生都回来了，他却咬着牙写信给妈妈：“我仍然记得当年您的教诲。妈妈，您放心，我绝对不会做一名逃兵。”

由于工作繁忙，张丽珠很少和孩子们在一起。女儿至今仍记得，妈妈的奶她从来没有吃过一口。女儿念小学时有一篇作文得了奖，回家兴冲冲地告诉妈妈。妈妈问她：“作文的内容是什么？”女儿说：“妈妈夜里又被人叫去抢救病人，我多么想跟妈妈在一起呀。”

张丽珠自嘲地说：“母亲我当得很不像样，但我却要为很多母亲尽心”。事实上，最初学医并非是她的心愿。在1937年，她一个小女子却怀抱“航空救国”的宏大志向。然而，兵荒马乱的时代，家里不允许她走一条艰难而前途未卜的道路。几经周折，张丽珠进入上海圣约翰大学医学院。1938年，父亲张耀曾突然因病去世，对张丽珠来说无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在纪念父亲的文字中，有这样一句话她记住了——“良医良相尽，此事最堪哀”。就是这句话坚定了张丽珠学医的信心：“我感到了医生的重要，而且我要做一名好医生，治病救人。”

相濡以沫一辈子的老伴唐有祺教授认为：一个不关心别人困难的人，是很难做医生的。一个医生没有眼光和胆识，也很难有所成就。他这样评价张丽珠：“这一辈子走过来不容易，虽有风风雨雨，却无怨无悔。”

【人物对话】

恳恳尽吾能，不暇问收获

记者：从医这么多年，您怎么看待医生这一职业？

张丽珠：在我刚做实习大夫时，有一天晚上，我从睡梦中被人叫醒。那时，从我的宿舍到抢救室，要穿过好几个庭院，一路上都是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但我顾不上害怕，很快振作精神，投入抢救。我初步意识到一个医生的一生，没有一时一刻能脱离自己的医疗工作。不论日夜，随叫随到，不能有半点疏忽。人的生命是宝贵的。医生手里把握着的是人的生命和健康。当一个医生面对病人时，实际上他正面对整个社会。

记者：您觉得一位妇产科医生必备的素质是什么？

张丽珠：你要理解妇女的痛苦和她们人生的波折。妇产科医生直接服务的对象盖住了半边天，她们的健康和幸福不能小看。在第一例试管婴儿顺利出生后，我收到了很多不育症患者的来信。她们向我诉说她们的痛苦，她们说在别人面前感到很自卑，人家都有孩子，而她们没有；不是她们不想要，而

是她们要不了。有的甚至导致夫妇两人感情不好了，婆媳不和睦了，一个好端端的家庭马上就要破裂了。而我是医生，病人有苦痛，我就要为她们解决。

记者：年轻一代的妇产科医生正在成长，您想对她们说点什么？

张丽珠：现在条件好了，做试管婴儿的不孕家庭越来越多。在试管婴儿室，医生为一位病人取完卵，护士马上推进来另一位病人。不像以前，我们什么都亲自做，从卵子和精子融合之前就开始关注一个生命，到它在母亲体内安顿下来，再到它平平安安来到人世间，甚至连这个孩子的成长过程都是我们心头的牵挂。当技术成熟之后，这些或许不那么必要了，但我们技术背后的人性化、个体化服务的理念一定不能丢掉。

我的父亲曾勉励我——“辛辛苦吾时，不知有穷逼。恳恳尽吾能，不暇问收获。”我把它送给你们，希望你们加倍努力，发挥出自己的聪明才干。如果你们认为我这个老人在某些方面也能拉你一把、搀你一下，我很乐意为之。

（来源：《健康报》2008年3月7日 第五版）



大陆首例试管婴儿诞生十周年



大陆首例试管婴儿诞生十五周年



大陆首例试管婴儿诞生二十周年



2008年中国大陆辅助生育技术成功应用20周年庆典



2009年参加WHO生殖健康临床医学基地揭牌仪式



2011年，获宋庆龄樟树奖

我的医教人生

张丽珠



1937年，我中学毕业，当时的志愿是学航空，响应“航空救国”的号召，要制造飞机，还要开飞机。当我高兴地考入当年唯一有航空工程学系的中央大学时，中央大学却从南京迁到了内地。在那兵荒马乱的日子里，家里不允许我走那条艰难而前途未卜的道路。我只好留在上海暨南大学借读，学习物理，半年后，进入上海圣约翰大学医学院（St. John's University Medical School）学医。医学原来并非我的志愿，但父亲突然在1938年因病去世，纪念他的文中写有“良医良相尽，此事最堪哀”。这使我感到医生的重要，我要做一名好医生，治病救人。学医并不容易，但我7年的学医过程很平稳，我专心一志，毫不费力。虽然从来未开过夜车，每天按时睡觉，但在发回的考卷上，却总能看到“Excellent”的评语。也因为回答很到位，字迹清楚，发考卷的时候，老师经常会以惊喜的眼光注视着我。1944年夏，我参加圣约翰大学毕业典礼。主席台上有颜惠庆和其他一些老师。我坐在台下毕业生的位子上，忽然听到叫我的名字，原来是要我上台领取最优秀毕业生奖（The Best Graduate of 1944）。典礼完毕，我的母亲和三姑，还有中学江校长都跑来向我祝贺。唉！我有什么可以报答他们的呢？

值得回忆的是，我在华山医院（红十字会医院）做实习大夫时，陆院长兼内科主任每周一次进行查房。我站在病人的床边，报告病历、诊断及治疗过程，并就提出的问题进行回答。手里拿着病历，但我从不翻阅。因为查房前我已做了准备，查房时就可以针对具体病情进行了分析。我认为这是最好的学习方法，是临床教学中是不可缺少的部分。我成为妇产科主任后，也同样注重以这样的方式带动我的下级和学生。后来他们告诉我，我查房时很严肃，从无笑容，讨论问题也很严格，有时“甚至让人受不了”。但是，正是这样的查房，使他们受益匪浅。

在我刚做实习大夫的时候，一天晚上，我被从睡梦中叫醒，在黑暗中从宿舍出来，走过几个庭院，到达急诊室，振作精神，抢救患者。我初步认识到一个医生的一生，没有一时一刻能够脱离自己的医疗工作，不论日夜，应该随叫随到，不能有半点疏忽。人的生命是最宝贵的，而医生手中把握着人的健康和生命。

1946年到1951年，我在美国和英国留学，完成了大量结合教学的临床医疗工作，收获很大。已具备高级医学教师的资格。



回国后，1952年，卫生部把我分配到北大医院妇产科，我开始给55届的学生在大教室上大课。不论我过去在大学的时候，还是后来跟王逸慧老师做住院医师，都是以英语教学为主，但我在讲大课的时候，却一个英文词不露。讲课的效果不错，条理清楚，学生很有兴趣，受到启发，当堂听懂了内容，还记得住。我还制作了很多新挂图，很结实，能用很多年。下课后我还会和同学们沟通，会和他们在楼下的草地上一起打排球。我中学时代还是全国女排冠军上海队中的重要角色呢！媒体称我为“代表队的灵魂”。全运会时，我坐在汽车里还有人拿望

远镜看我。我原来计划参加远东运动会，但抗日战争开始，计划取消。我闷在上海学医，没有参加排球比赛的可能了。1952年国庆节，我第一次在天安门城楼下游行，路上看见了原来的排球教练。后来，他还打电话问我是否还能参加排球比赛。



我于1955年在北医附属医院系统开始培养第一批研究生。第一个研究课题实际就是我在英国研究的继续——“硫酸镁对子宫收缩的影响”。我用从英国带回来测量宫缩的仪器，记录宫缩的强弱。后来一个时期，进行子宫颈癌的研究，观察子宫颈癌前后变化。我从英国带回来了阴道镜。这些仪器都未能充分发挥作用，文革中的大字报对我进行批判的同时还批判了这些仪器。



1958年至1960年期间，三院刚创建，八大学院大批女学生闭经事件引起我的注意。我们对其原因进行调查，后集中到生殖内分泌方向进行研究。我们发现问题并不是原发于卵巢，而是下丘脑-垂体-卵巢轴。下丘脑和环境有关，当时女学生们参加重体力劳动，营养不足，这些首先会影响到她们的下丘脑。由此，我们优先建立了生殖内分泌测定的实验室，开始学习一些新的实验方法，如放射免疫测定等。当时，还得到过动物所张致一先生的帮助和指导。我们的论文报告《输卵管结扎手术对卵巢功能的影响》，不仅有临床还有实验，理论结合实际，在1964年的医学报告会上得到好评。



之后，在治疗月经不调的基础上，我们对不孕不育的原因进行了调查，并在一穷二白的条件下开展了体外受精-胚胎移植，即试管婴儿的辅助生殖技术研究。我们当时连人卵的形态都不认识，我们的骨干人员就抱着保温瓶，里面装着刚取出来的卵泡液试管，小跑步经过操场，去组织胚胎教研组请刘斌副教授找卵。

群众不懂什么是试管婴儿，误认为用了他人的精子。还有这样的说法：“我们国家人口这么多，还搞什么试管婴儿？”“和计划生育政策对着干！”“试管婴儿对我们国家有什么好处？”就是在这样的舆论压力下，1984年我们开始了试管婴儿科研工作。1986年争取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及国家“七五”重点科研项目“优生——早期胚胎的保护、保存和发育”，其成功的标志就是试管婴儿临床妊娠成功。协作组由三个单位组成：北医三院、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生殖和遗传研究中心（卢光琇），

北京协和医院妇产科（何萃华）。各组独立研究，定期交流，互通有无，这又是一个学和教的好机会。

1988年3月10日我国大陆首例试管婴儿在北医三院诞生，取名郑萌珠。“萌”的意思是萌芽、开始，“珠”是感谢她的缔造者——张丽珠。郑萌珠的妈妈郑桂珍是甘肃省陇南礼县盐关镇民办小学的教师。郑萌珠的祖父是老中医，四代单传。郑萌珠来北京求医时已38岁，结婚20年，招赘农民女婿左长林。郑桂珍经检查明确为输卵管不通，即需进行体外受精-胚胎移植技术，妊娠成功。这是北医三院的第13例IVF-ET。在第一例试管婴儿10岁生日的庆祝会上，郑桂珍发言：“是试管婴儿技术给予了我做母亲的权利。”我国大陆第二例试管婴儿又于1988年5月27日在北医三院诞生。第三例、第四例试管婴儿于6月份在湘雅医学院诞生，其中一例为赠送胚胎。

在初期，我们采取的策略是：开腹手术治疗盆腔疾病的同时取卵，这样，即使取不到卵，也能完成治疗。我们发现患者盆腔内充满粘连，卵巢表面根本暴露不了，必须用手摸到卵泡所在，才能抽吸卵泡液。我国北方的输卵管阻塞病约占1/3是结核病造成，如果我们按照国际当时常用的腹腔镜取卵法，会遇到很大困难。之后，我们超越了腹腔镜，进行B超下阴道一根针取卵。这种方法创伤最小，到1989年成为常规方法。

我们的体外受精-胚胎移植例数逐年增加，从最初的每年32例增加到60多例，后超过100例，到如今的3800例（其中包括冻融胚胎移植）。临床妊娠成功率从最早期的6.2%提高到到近期的40%左右。过去从诊断，到用药促排卵，观察，取卵，直到移植后处理，全由一个人负责。现在，各项操作已有常规，生殖医学中心有多个专业人员，专项操作，每日流水作业。2002年我们从原来的两间小屋扩展到2500平方米的生殖医学中心。卵泡液从取卵室的窗口递给实验室人员，即可得知卵是否找到。仪器从外国进口，器皿一次使用，试剂配好备用。



1988年后，我们每一到两年就举办全国或国际生殖医学研讨班，传播推广试管婴儿技术。现在，此项目已在全国范围内开花结果，许多省、市、县都建立了生殖医学中心，约有200多个已通过卫生部检查。生殖医学已经成为三院及妇产科的重点学科。生殖医学一方面为了满足患者治疗的需要，另外，还提供了人类生殖模型，可深入了解从卵母细胞的发育到胚胎植入子宫内膜的人类生殖过程。

生殖是人类生命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人类的繁殖和进化，必须要有生殖医学。这其中有永远做不完的医、教、研工作。

